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五六）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一九期 ——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212d）

---

【当事者说】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许寅
【史料辨析】汪东兴回忆录读后感	王年一·何蜀
【旧文照登】对邓小平的揭发	邓榕
【历史资料】我们是在斗争中平反的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三十二）	周孜仁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当事者说】

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

• 许寅 •

陈励耘何许人也？原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是也。1971年“913”林彪事件不久即被捕。最大罪名是“阴谋暗害毛主席”。此罪传达到全国各地，几乎人人“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其名甚至远扬海外——巴黎某博物馆陈列中国文化大革命“十五名巨恶大憨”中，此公居然名列第十四。被捕之后，即杳无音讯。前不久，忽得消息“此公无恙”，目前已安居浙江嘉善，苦度晚年。记者原本好事，嘉善又近在咫尺，于是于1988年11月15日来嘉善，到陈府作不速之客。

下车伊始，直奔嘉善县民政局——来此何干？因据了解：陈励耘居嘉善，非党、非军、非政、非群（群众团体），而归民政局“照顾”。直奔民政局者，首先了解三条：一、陈励耘是否判刑“保外执行”之类，二、陈励耘是否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三、如果享有公民权，记者见见，可不可以。

县民政局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并且明确表示：一、陈励耘从未判刑（这是“重要新

闻”），二、他享有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三、接见不接见记者，由他本人决定。

上午10时30分，记者带著老好奇，敲了陈家的大门。进门，只见一老人，身高一米七六上下，腰板笔挺，身材魁梧，“国”字脸堂，两道浓眉，一对大眼，高鼻阔口，虽然年近七旬，仍然虎虎有生气。正手拿火钳，在侍候煤球炉子。一见我进门，就说“已经快二年没有同你们记者打交道了！”

因为时近中午，未便多谈，记者说明来意，再来畅谈一番，陈欣然同意。

#### ◇ 罪行一条

下午12时30分再去，气氛就相当轻松。记者先要求看看军事检察院的决定书。他很快取出原件，让记者照抄：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免于起诉决定书

（82）军检免字第10号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63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1938年3月入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1971年9月20日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逮捕，现在押。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6月13日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1971年3月31日晚至4月1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于新野陪同下，于3月31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杭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检察长 于克法

1982年3月10日

“你看了这份起诉书，有没有上诉？”记者问。

陈回答得很干脆：“用得着上诉吗？我已经关了十多年。再上诉，再审理，什么时候出得来？”

记者知道他“腹外有话”，但既系第一次见面，彼此知之不深。一上来便谈“敏感性问题”，

恐怕难以吐露衷曲。于是，先把话题绕开：“请你先谈谈历史”。两人一问一答，花了近两个小时，才把他的一部历史谈完。

陈励耘，成都人，1919年生，70岁。1935年17岁，就学于成都天府中学时，即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教育，参加革命活动，曾多次同当时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同志见面。1937年8月，入抗大。1938年7月入党。毕业后，一直在部队工作，任空五军的政委。

从陈励耘的历史可以看出：一、陈励耘参加革命后，一直受到党的信用；二、因战功升迁，是个典型的“台阶式干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历史上同林彪毫无关系。

#### ◇ 同林彪见面仅一分钟

“从历史看，你同林彪毫无关系。后来又怎么同林彪认识的？”记者开始“不知不觉”引入正题。

陈励耘回答得很有趣：怎么认识的？天晓得？我同他只见过一次面，见面时间不到一分钟。1969年4月，我被总理提名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当年冬天，我去北京。忽然接到通知，林副主席要召见我，我不敢怠慢，当即赶到林彪家里。叶群便领我到他会客室门口，我只看见他坐在沙发上，叶群上去同他讲了几句。他抬起头来朝我们看。我连忙敬礼，恭恭敬敬说：“问林副主席好”他只回答三个字：“好，好，好”三个字。刚讲完，叶群就说：“让首长休息吧”便领我到她自己办公室，引我看了一场日本电影——大约是《啊，海军》。看电影之前，与叶群、林立果照了一次像。林立果一言不发。叶群忽然说“你的帽子戴得太低了”，说着帮我整了整帽子。这一张像，到了审查我的时候，居然被当成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叶群帮陈励耘整冠、内中有什么奥妙。

#### ◇ “林彪行宫”（704工程）之谜

“你那次进京，又为的是什么？”

“这倒同林彪有关系。就是去向中央汇报浙江省革委会为林彪造房子的事情。”

这一问一答，记者顺水推舟，即请他详细谈谈“林彪行宫”之谜、他回答得非常详细：

“1969年初，江腾蛟到空五军来，我去看他。先谈了一通浙江形势大好，他忽然说：‘我有个想法：你们给林副主席修一幢房子，怎么样？’我说：‘警卫处有很多房子，拣一幢改一下，不就行了。’他笑着说：‘哪个要住修改的房子啊。’见他这个样子，我就说：‘我不能作主，考虑考虑吧。’讲到这里，我就告辞。一想，此事有点难办。第一，我知道江腾蛟这个人不好惹。他原是高敬亭的部下，后来告发高敬亭叛变立了大功（高被害，纯属冤案，现已平反——笔者注）。第二，他同林彪关系特殊。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是否得之林彪本人暗示？考虑及此，我就不敢自作主张，向南萍、熊应堂提出此事，一同商量。熊是个大炮，马上说：‘当然可以嘛。’南萍也说：‘可以。’我却觉得不大踏实，因为弄不清是不是林本人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不是小事情，要向中央报告。’”

“到了当年夏天，毛主席到杭州来。汪东兴、张耀祠同来。我同南萍、熊应堂商量后，由南萍向汪东兴请示：‘我们想给林副主席修幢房子，可以不可以？’（没讲是江腾蛟先提出来的）汪说：可以嘛。现在可以给林副主席修了。汪又说：‘那就一定要修好。设计一定要搞好。设计图纸给我看一看。’然后，汪、张二人还向我们讲了林彪生活特点：怕晒太阳，怕风，好在房子里散步等等，还要我们注意‘防空高标准’。”

“过了两天，”陈励耘继续说，“我和张耀祠搞了张草图，给汪东兴看了。汪说了八个字——实用，安全，朴素，大方，基本肯定。看完草图，我和南萍、熊应堂陪了汪、张二人到三台山看了地点。我和南、熊所以选这为个地方，主要考虑它比较安全，离空军疗养院又比较近。汪张二人也都认为可以。我们就要浙江省建筑学院副院长，带了五个设计人员，住进警卫处设计。我问南、熊：‘工程由谁管？’南萍说：‘警卫处归你管，你管算了嘛。’我就答应了。”

“设计进展很快，到1969年9月即已竣工。开始估价2000万元，后来涨到3000万元，到1970年夏竟说要4200万元。我急了，关照：你们不能再涨了，只能这个数了。”

“1969年冬天，你到北京，同林彪见面一分钟，大概算是对你搞这个工程的嘉奖吧？”  
“大概是吧。”陈并不讳言，“我那次去，正是为了向军委办事组报告工程设计经过。不知是谁告诉了叶群，她就安排了这次不到一分钟的见面。”

“第二年10月，工程开工了。据了解：原来准备选在4月12日这天开工，以纪念1927年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因筹备不及，才延到10月。1970年7月，毛主席再到杭州，汪东兴和张耀祠部亲自看过设计图、沙盘模型，还作了些修改，说明这一工程，一开头就是由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批准，最后设计也是他亲自审定的。直到今天，浙江宾馆（即原来的“704工程”）的导游人员在介绍时，还在说这是‘林彪死党为他们的主子效忠的产物’，实在冤枉得很。”

#### ◇ 卷进两位主席之争

1970年秋天，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讨论新宪法。围绕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两位主席——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一次生死大搏斗。结果，林彪惨败，跨出了走向“温都尔汗”的第一步。陈励耘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林彪的讲话，读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这张与《炮打司令部》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大字报，还认真学习、讨论、研究过一番。然而，可怜而又可笑，直到垂头丧气下庐山，他还不知道两位“统帅”之间有任何不和，《我的一点意见》矛头只是指向那个“天才理论家”陈伯达而已。下面就请听听陈励耘谈谈自己在这场风暴中的经历吧：

“这年夏天，主席在杭州住了三个月，直到9月上庐山。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和南萍、熊应堂也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情。’”

“上了庐山以后，林彪有没有派人向你打过招呼呢？”记者问道。

“林彪当然不会派人向我打招呼。倒是林立果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得还挺神秘：在林彪讲话前夜，忽然有人给我打个电话，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听声音，楞了，分明是林立果嘛。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

“第二天，我怀著紧张的心情，听林彪讲话。他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只是说有些人企图反

对毛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我因为听过林立果的电话，知道指的是谁。回住所的路上，南萍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我只含糊答应：‘是有所指的’。”

“林彪讲话以后，等于开水烧锅，你又怎么样参加讨论呢？”记者急于想了解其中的秘密。

陈励耘回忆得很详细：“第二天，我们去参加华东大组会。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是杨得志，韩先楚、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王展、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韦祖珍（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彭冲、南萍、熊应堂和我，都属于华东大组。”

“华东大组开会，本来一开始就要讨论林彪讲话，可是王洪文、徐景贤却说：‘陈云为什么在山下不来开会！应当要他来。’那时候陈云同志身体很不好，到了九江，怕山上空气稀薄，没有上山。我们知道这个情况，都不同意。他们却非要陈云同志来开会不可。第一天会就没有开起来。第二天，陈云同志果然被逼上来了，坐在旁边气急得很。那天我大概是第四或第五个发言者。前面几个泛泛而谈。我一上来就慷慨激昂：‘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我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我面前，还没等我讲完，就回过头来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最后我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清楚’这一来，会上火药气很浓。别人都不吭声。”

“张春桥呢？王洪文、徐景贤他们呢？”

陈答：“他不动声色，只是一个劲地记我们的讲话。王洪文他的面孔板起，也一声不响。休息时，杨得志问我：‘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我答：‘什么人反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我到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来了，问我：‘老陈，你到底在讲谁？’我反问：‘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韩不响，走了。韩一走，韦祖珍拉我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

可以想象：那时候的陈励耘是踌躇满志的。自以为得到了来自“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信息，拿得很准，既出了自己的宿气。又“紧跟了林副主席”。谁知道风云突变：没有几天，毛主席贴出了《我的一点意见》这张大字报，揪出了“天才理论家”陈伯达，林彪一伙落荒而逃。

我们的老兵们怎么样了呢？陈励耘接着谈了庐山会议后几天的情况：“《我的一点意见》发表后，张春桥他们神气活现。华东大组在讨论的时候，我只好检讨。那个会总理、江青都来了。我还没讲完，张春桥指著我的鼻子说：‘你整我、我根本不在乎。’江青也来凑热闹，插话：‘你不听主席的话，就听陈伯达的话！’这时候。程世清出来为我抱不平：‘这个会议是党的会议。党员有意见，应该在党的会议上讲。如果有话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不让他他在党的会议上把话讲完，以后谁还敢在党的会议上讲话，应该让人家把话讲完。’程一讲，总理也冲著江青说：‘你让陈励耘同志把话讲完。’我就顺势下台、说‘总理我没有什么话讲了。’”

听到这里，记者少不得追问一句：“在讨论《我的一点意见》的时候，你确实不知道这是针对林彪的？确实不知道是两个主席的斗争？”

陈励耘回答得很乾脆：“我确实不知道。”

“许世友呢？”

“他也肯定不知道。反正我们这些当兵的都不知道。方毅同志他们是否知道我不清楚。他

们纹丝不动。”

◇ 成了“浙江的‘头’”

讲到这里，已近黄昏。一看时间不早，还要当晚赶回上海，记者便单刀直入，问及要害：“军事检察院指控你的主要罪行，是参加林立果召集的‘上海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你为杭州的‘头’，你‘接受了这个指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谈这个问题，陈摇摇头，长叹一口气，先说了一句：“真讲不清楚！”接著详细叙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当时极为有名的“上海会议”（也即“三国四方会议”）的经过：

“庐山会议以后，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仍旧一点没有想到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到1971年春天，身体不好，就住进了453空军医院。3月28日下午，我的秘书王明寇来告诉我：‘于新野来了，要来看看你。’我说：‘请他来吧。’于当时是空军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一见我就说：这次我来有一件事：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后来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我实在不想去，有个指导思想：二中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到3点，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当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我就带了王明寇，同于新野坐了张金富开的车，开往上海。到了闵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这样一些人：王维国夫妻两个，空司作战部长鲁岷的老婆武虹桥，还有于的秘书和两个处长。一看见我，热情得不得了。王维国还说：‘我们是特地来接你的。’说着就拉我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了原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在餐厅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立果、江腾蛟都来了。王随即领我上楼。江腾蛟、林立果两个人在扶梯口接我。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先讲：‘老陈，我们简直把你憋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生病，来一次也难。’然后又说了些闲话，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再扯，我就讲了‘704工程’情况，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著，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挥所等方面的情况，都问了。’

“还谈了些什么？”记者听不出名堂，总认为不能这么简单。

“后来又谈了备战问题。我就讲了飞机改装问题。还说：‘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一门。’接著，我又吹了一通我们空五军为应付敌人空降、机降，研究了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扯了一阵子，有人扯到了二中全会。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接过林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林又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这时，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我对他们突然冒出这些话感到吃惊，就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快近一点了。

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到近二点，周建平来了。周一到，江腾蛟说：‘南空党代会’事不是要谈一谈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建平就讲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

“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又讲了一句：‘今天我们开“三国四方会议”。’我不懂，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说：‘周是南空，你是五军，王是四军，我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大家听了也不作声。”

这时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

“从头到底，就没有一个人说两个主席有矛盾？”记者追问

“没有。绝对没有。”

“也没有人提到‘571工程’？”

“没有！绝对没有”

“你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阴谋反对毛主席？”

“没有。绝对没有。”

“林立果要你负责杭州，你也没想想负什么责？”

“根本没有想。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累得要死回来，还想这个干什么呢？” “你既不想，也不问。回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向中央报告？”

“没有，要命就要命在这里罗。”

◇ “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

谈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时候，陈励耘还带点懊丧情绪。可是一听到记者问起：“你谋害毛主席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他可立喊起来了：“我怎么会谋害毛主席？这真是天大的冤枉。”但是，当年逮捕他以后，我们听到的传达中，陈励耘作为“林彪死党”的最严重罪行，是1971年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阴谋谋害毛主席，有根有据，内容非常具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且听他本人慢慢道来：

“1971年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一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谈话最后，毛主席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就说：我们一切都难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他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就这样，主席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谈话第二天下午，汪东兴要我找南、熊二人一起，回忆主席在列车上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后来南萍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事也就完了。现在回想这件事，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说，‘这没有什么，错了改了就好了。’”

“这样面对面讲林副主席的错误，你还没有意识到毛主席要整林彪？”记者忍不住再问一问。

“那里敢这么想呢？主席讲得根清楚：林副主席要保嘛。住了一个星期，主席要走，我去送行。”陈终于谈到了要害问题，“专列就停在杭州火车站。站上一只大钟下面有一个入口处，就是主席进站的地方，汽车由此开进站台。主席自己带一个警卫连走在前面，我派一个警卫跟在后面，准备接应。主席下午三点从汪庄出发，我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他上车。然后，

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车上有我的秘书王明寇，还有个警卫干事孙世臣。”

陈说：“我是有一支枪，但这支枪没有带在身边，而是放在包内，留在车上。关于警卫中央首长带不带枪的问题，我专门请示过汪东兴——大约是1969年，浙江省革委会指定我负责抓警卫处的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中央有个规定：部队人员进北京不能带枪。因为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专门请示了一下。汪东兴说：警卫人员嘛，当然要带枪。意思还有点怪我多事，连这也要请示。从此，在毛主席周围的我们警卫处人员都带枪。”

“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

“还传说你准备用飞机轰炸主席的专列，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事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1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苕桥来，让我们看看吧。’一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二十九两师各调一个团到苕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

所谓“谋害毛主席”从头到底就是这么一回事。

#### ◇ 在上海被捕

林彪“9.13”自我爆炸，由于严密封锁，陈励耘开始毫无所知。自从同毛主席谈话以后，他心里反倒踏实下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副“手铐”在等着他。他的被捕，是蛮有点戏剧性的。

“1971年9月19日，我回军部看了一下有没有事情。9月20日下午回警卫处，处理主席走后的遗留事项。忽然接到南萍来电：‘中央有个文件到了上海。只有一份，省里不发，要我和你到上海去看。’到了上海锦江饭店，有人专门送到一个剧场门口。王洪文的秘书宣布：随行人员，都不要进内，到别的地方休息。接著王秀珍出来领我们进去。在座的有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说：‘中央有个文件，陈励耘同志你看一下。’我看大吃一惊，原来就是林彪出事的那个文件。但是我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出什么问题，因为自己思想上确实没有想到同林彪会有什么牵连，看了以后，王洪文突然宣布：现在中央命令：要逮捕你！这不是我的命令，是中央的命令。”

记者急问：“中央什么人命令？是不是有毛主席命令？”

“不知道是谁的命令。王洪文没有让我看这个命令。”陈接着往下说：“我一听自然有点紧张，我当时说，是主席的命令我服从。这时早已埋伏在两边的南京军区的四个人，走出来要把我带定。这时我定了定神，站起来，说：‘走吧’。这时听到王洪文在后面说：‘你们注意一下，他身体不好！’”



“把你押到哪里？”

“押到剧场后面一个小地下室，到下半夜，喊我起来，押上一辆卡车，一直开到南京军区通讯兵学校。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房间里，外边有警卫看守，每星期可以洗一个澡，关了两个月，大约12月初，押到北京。”

“两个月审查些什么？”

“主持审查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政委吴大姓，还有一个保卫部长。专门管我的，是保卫部的一个保卫科长。每次到临时法庭受审。我实在不知道该交代些什么。他们就启发：上海黑会，改枪改炮，战备等等。我都尽自己所知讲了。”

“但是，他们总说我不老实，向我施加压力，一定要我承认参加了一个什么“计划”（实际上就是571工程）。我被逼得没办法，就顺了他们的启发，编了个假供。谁知他们一看就不相信。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许世友来看我了，先说：‘你身体好不好？身体要注意。一部《封神榜》六十四回，回回要交代明白。’说完，又讲了我一些好话。看他的样子，好像也弄不清我是个什么问题。在南京搞了两个月，搞不下去了，就把我送到了北京，交给中央直接审查了。”

#### ◇ 进了秦城监狱

陈励耘被押到北京，先交北京卫戍区看管。第二年二三月间，纪登奎找他谈话。纪说：“鲁岷已经交待了，要到你那里去驾驶飞机轰炸毛主席的专列。你能说得清楚吗？”陈励耘反复说明并无此事。后来，有一位同志找陈问：“这个会议（指“上海会议”）开了，你们都表示同意。”陈答：“没有什么同意。”他又说：“你就写吧，写了对你有好处。”

“你写了没有呢？”记者问。

“我就照样写了。”

看来，当时根据掌握的材料，陈励耘的问题已经基本清楚了——同“571工程”没有牵连，谋害毛主席也没有证据，所以想对“上海会议”的问题做个结论了。审查应该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到第二年4月，陈被转到北京西郊东南亚学生疗养院，靠近北京军区，也就是北京军区看管了。

“大概住了五年。1976年‘四人帮’粉碎以后，我们都怀着很大的希望。那时已重新发还我们领章、帽徽，生活也很优待。谁知这一年12月的一天，北京军区的一位保卫科长忽然把我找去，‘跟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跟他上了小汽车，进了秦城监狱，先到办公室，有人向我宣布：华国锋主席命令，把你逮捕关押。说完，就有人重新把我的领章、帽徽摘去，再送进牢房。”

#### ◇ 出了秦城监狱以后

在秦城监狱住了五年，到1981年9月，陈励耘脑血管硬化症状明显，老是晕倒，便把他送进复兴医院高级犯人病房。又住了半年，军事检察院才派了两个干部到医院，向他宣读了那张《免于起诉决定书》。第二天，南京空军司令部干部部的一个干部接他出院。医院指定一个医生陪同，把他送上软席卧铺。一直来到南京，再转到安徽巢湖温泉疗养院继续治疗。

在十年监狱生涯中，不准接见家属，也不准通信。分别时，他和妻子都只五十来岁，等到老两口重见，却已经“白发萧萧三千丈…了”。见面后悲喜交集、一致感谢 11 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才使他们一家有重新团圆之日。治好病后，组织征求他的意见：把家安在哪里？他要求安在浙江，因为四个子女都在浙江嘛。到浙江哪里呢？杭州，陈有自知之明，知道进不去，退而求其次，嘉兴吧。可人家不欢迎。再退而求其次，要求到嘉善，嘉善县各方面对他都很照顾，特地请县公安局专门把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一家住。又把他们的大女儿，一位小儿科医生，调到嘉善照顾他们生活（现在因照顾夫妻分居，已调大松汇照相机厂，每星期来探望一次）。对于嘉善有关部门，特别是民政局的照顾，他们确实非常感激。

“这几年生活过得怎么样？”

陈苦笑：“关于我的待遇问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政治待遇照一般干部，生活待遇是每月一百五十元。1982 年这个数过得可以。这两年就有点紧张了。”

“党内给你做了什么结论？”记者免不了一问。

“没有做结论：既不宣布党内处份，也不让恢复组织生活，只是挂在那里。待遇苦一点不在话下，最痛苦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就这样糊里糊涂离开了组织。”

谈到这里，他又指指老伴：“还有她！我参加过‘上海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杭州的头，自己不加拒绝，犯了法。她算犯什么法？关了她那么多年，到今天也不给个结论，实在很令人伤心。”

□ 原载《金岛》

~~~~~

# 【史料辨析】

汪东兴回忆录读后感

• 王年一 • 何 蜀 •

1997 年 11 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汪东兴着《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正文前有一篇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

该书所写到的历史，是当代中国那一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作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 31 年之后，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作出政治结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 16 年之后出版这本书，自然应有新的“研究”，新的“总结、提高、发展”。

然而，读了这本书，却使人感到惊异与迷惑不解：在这部 12 万 5 千字的长篇回忆录中，不仅看不到新的“总结、提高、发展”，反而从中共中央那个《历史决议》倒退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然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毛泽东对这场由他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应负的主要责任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只有伟大、英明、正确的一面，只有毛泽东的“非凡的胆略和气概”、“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胆识”等等；“文化大革命”中几亿人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严重教训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只有毛泽东“为我们党和国家战胜野心家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一根本错误也看不到了，读者看到的却是独有毛泽东精通和掌握了马列主义真理，而“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几个“假马克思主义者”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

尤为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竟将毛泽东在当时特定情况下所作的、包含不少错误内容的讲话，不加分析、不加说明地大量引用，奉作经典。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十次路线斗争”。

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的开篇第一章《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第一段，原文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在这一段话之后，作者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作出应有的说明，而只用了大量篇幅论述毛泽东的伟大、英明、正确。实际上，放在正文之首的这段话，就成了全书的总纲。全书正是按照“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来叙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党内斗争的。

除去在正文第一段引用那段话外，书中还反复多次提到中共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比如：

第101—102页：“毛主席总括说：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

第106页：“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卜占亚又谈起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他说：中国党有十次要分裂，没有分裂成。”

第109页：“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里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

第115页：“毛主席说：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第135页：“他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

第139页：“毛主席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

第141页：“毛主席再三说：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

第143页：“毛主席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第171页：“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

第180页：“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

.....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一代，不会有几个人知道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恐怕也大多再记不清当时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是哪十次了。而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又并未将所说的十次都一一列举出来，这就可能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每一次“路线斗争”都是毛泽东与错误路线或反革命路线的斗争。因此有必要在这里重新列举一下，看看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是作者记叙的毛泽东在1971年那次南巡时对沿途领导干部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并在以后几年里被奉作经典，要求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复学习。按照当时的说法，在这十次“路线斗争”或“十次分裂”中，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一方依次是：

- 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 四、“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 五、“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 六、“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
-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 八、“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 九、“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说的“十次路线斗争”。

所谓“路线斗争”的提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历史已经证明，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同情况、不同性质的分歧和斗争都一概看成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一概说成是“路线斗争”，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是危害极大的。

邓小平同志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1980年3月—1981年6月）中，就曾对“十次路线斗争”的提法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在谈到“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时，他又说：“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这一次和彭、黄、张、周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也不好说是什么路线斗

争。”他还否定了“罗章龙是路线错误”的提法。他严肃指出：“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3—308页）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已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对党内不同情况的争论、批评或斗争，均作具体分析，是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

但是，《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在书中却把这个已经被抛弃了的“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始终当成正确的教导反复引用，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全书。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和迷惑不解。

邓小平同志谈到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时严肃指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而该书作者在十多年后又重新大提“十次路线斗争”，能够说是郑重的吗？

更何况，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第八次和第九次，早已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冤案获得彻底平反：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平反——《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辞去其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得到全会批准的。

作者在书中几次引用毛泽东历数十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时，一方面照录了对瞿秋白的不实事求是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有意识地略去了有关第八次和第九次“路线斗争”的讲话，总是在讲了高岗、饶漱石（第七次）后就跳到讲林彪集团。事实上，毛泽东当时谈到第八、第九两次“路线斗争”时说过：“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刘少奇那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

作者略去了毛泽东对彭德怀和刘少奇的评价，是不是就表示不同意对这两次“路线斗争”的评价呢？翻遍全书，只在《后记》中能看到一点间接的说明。

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这模棱两可的、语意含混的12个字就可以取代书中大量地方都应有而没有的说明吗？

作者是出于“尊重历史”的考虑，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没有对毛泽东“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应有的说明吗？不对，因为书中另有对当时“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的讲话作出更正性说明的例子。

在该书第138页，写到毛泽东批判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时，作者特别加了一段说明：“后来，据杨成武同志讲：受到毛主席批评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是总参政治部组织人写的，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叫署上杨成武的名字。杨成武说这篇文章他没有看，那时他正和我陪同毛主席巡视南方。”

在该书第145页，写到许世友告诉毛泽东，他同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都比较好时，作者又特地加了一段说明：“在当时的条件下，许世友讲这些话也是可以理解的。”

杨成武为那篇“大树特树”的文章蒙受的不白之冤，自然不能与彭德怀、刘少奇的大冤案相比。至于许世友与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如何，则更不能与“路线斗争”相提并论了。既然对这些事都专门花费了笔墨加以说明，可见作者在写作中并不是只作“尊重历史”的“实录”，而是也能站在今天的角度对“在当时的条件下”的某些讲话加以说明的。那末，为什么却不对彭德怀、刘少奇这两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作出应有的说明呢？

与“十次路线斗争”相关联，书中还有另一些含有重大原则性错误的毛泽东讲话，作者未加应有的说明。

比如，该书还反复提到“反九大路线”的问题。

作者引用毛泽东在叶群检讨书所作的批示说：“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见该书第70页）

作者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话：“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三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见该书第92页）

还有：“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三中全会三项议程……”（见该书第99页）

还有：“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三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见该书第118页）

……

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能说得清楚所谓“九大”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给读者（特别是今天的青年读者）的印象就会是：“九大”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反九大路线”自然就是“反党”。

那末，“九大路线”到底是什么路线呢？作者在书中全文抄录了他因在九届三中全会上附和了陈伯达的发言、赞同了设国家主席而作的两次书面检讨，写于1971年4月18日的第三次检讨书中说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见该书第81页）

在这里，作者说得比较明确了：“九大”路线就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若单从字面上看，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自然是很好的。但是这句口号是毛泽东在“九大”上提出来的，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九大”上要求的所谓“团结”是什么意思呢？“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

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这时所说的“团结”，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判的老干部搞好团结，二是要已经在“九大”前夕起草政治报告时就暴露出了矛盾的林彪一伙与江青一伙搞好团结。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这个“团结”都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有害而无利的。

所谓“争取更大的胜利”，首先得看“九大”已经取得的是什么“胜利”。在“九大”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经毛泽东审定的政治报告，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九大”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召开的，这个“胜利”就是“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要在这样的“胜利”基础上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会是什么好事情吗？

既然“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那末“反九大路线”岂不是正确的了吗？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反九大路线”，又该让人怎么理解呢？

在该书中还不加说明地多次引用毛泽东讲话，称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是“反革命的”，指责当时北京军区领导人李雪峰、郑维山“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在称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林彪集团的“五位大将”的同时，将李雪峰、郑维山与之并列称为“两个大将”，把撤销李、郑二人的领导职务、改组北京军区的作法说成是“挖（林彪集团的）墙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华北会议》辞条里已经说明：“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虽有正确的一面，但列举的种种‘罪行’，有许多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李雪峰、郑维山工作上虽有缺点、错误，但与陈伯达是一般工作关系，说他们参与陈伯达‘反党活动’是没有根据的。中央已于1979年12月6日为之平反。”此外，中共中央在1982年4月1日为李雪峰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党籍的决定中，已同时为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平了反。

既然是中共中央在十多年前就已经作出过平反决定的人和事，为什么作者不加任何说明呢？

作者在书中对许多这样应作说明的地方都未作说明，为什么又对个别事件（如对杨成武与“大树特树”文章）作了更正性的说明呢？是不是因为杨成武的冤案是毛泽东生前已承认搞错了，决定平反，而对其他人与事的错误评价，毛泽东生前没有表示应予平反呢？是不是还有“凡是”的观念在制约着或影响着作者的写作思想呢？

作者在所记叙的事件中是重要的当事人。在该书中，作者用了3页多的篇幅记叙九届二中全会大会开幕之前于1970年8月2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者列席了这个会议并担任记录。该书详细记叙了谁先发言，谁后发言，甚至连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这样的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但是只字未提有关“设国家主席”的讨论。

然而，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第386—387页里，却有这样的记载：“8月22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

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纲领”的。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作者却回避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以外全都赞同设国家主席的发言。这能说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吗？像这样有意识地对历史事实加以剪裁从而误导读者的地方，书中还有不少，本文不再一一列举。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实录”中回避重大的历史事实，并将毛泽东对中共党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过的错误评价不加任何说明而当作伟大领袖的英明教导大量引用，这对一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了解过去历史的青年读者，不是会以讹传讹地造成错误印象，产生不良影响吗？这样作，又怎么谈得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呢？

既然在若干重大原则问题上连应有的“实录”或说明都没有了，又谈何“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呢？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论及林彪事件时，就已作出过科学的结论：“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而在以“十次路线斗争”为纲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中，却一点也看不到正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林彪事件这样的结果，看不到林彪事件如何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在作者笔下，这一具有深刻社会政治根源的重大历史事件变成了少数阴谋家的“宫廷政变”。显然，这既不能算是“尊重历史”，也更谈不上是对研究历史的“总结、提高、发展”了。

~~~~~

## 【旧文照登】

### 对邓小平的揭发

• 邓 榕 •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或者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



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妈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匆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的。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

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 原载新北大公社 0 2 6 2 1 支队编《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 9 6 7 . 4

~~~~~

#### 【历史资料】

我们是在斗争中平反的

•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 •

六月二十日，我院近两千人起来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工作队。“六·二〇”革命行动是我院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后，群众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发扬和集中表现。但是，地院史上这一伟大的光辉的一页，却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打成“反革命事件”，许多人被打成“反党”、“反革命”。臭名昭著的薄 X X 批示象万吨水压机一样，把革命派压入十八层地狱，造成了地院空前的白色恐怖局面！

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在外界的压力下，工作队队长、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先后作了个“总结报告”和检查，声言：反工作队不能说是反党，并向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学生赔礼道歉，给他们“平反”。以后，还退了一点整学生的黑材料。看来，这个“反”也就“平”了！

然而时隔两个月后，有人还说《东方红》（其成员大部份是被工作队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学生）是“反革命”、“暴徒”组织，仍然因顶着“反革命”、“暴徒”的头衔而遭到围攻、殴打；甚至连同《东方红》联系的其他群众也遭到同样的“待遇”，污说这些群众和“反革命”串通一气……

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教育了我们，不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批臭、批烂，不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来，革命派就不能翻身！即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故作姿态，开了一个会，退了一点黑材料，做了几个小动作，“平反”也不过是纸上谈兵，毫不解决实质问题。

实质问题是什么呢？

平反的实质问题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激烈的斗争，就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辉的十六条的指引下，我们于八月八时自发地组织了全国第一个《东方红》战斗队，打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我们同保工作队的“势力强大”的“斗批改”战斗兵团展开了激烈地斗争，举行关于工作队问题的辩论会，多次炮轰地质部党委，一直抓住工作队、地质部的问题不放，坚持斗争。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在地质部举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威震北京的全国第一次绝食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三天不给我们送饭，妄图把我们赶出地质部。但是，饥饿算得了什么？我们在第三天晚上还举行了联欢晚会，并豪迈地说：“我们要革命，不要馒头！”他们多次调来臭名昭著的御林军——西城纠察队骇人听闻地围攻、打骂我们，但是我们对革命磐石般的忠心毫不动摇。打吧，骂吧，我们牢记着主席的教导：“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了我们使不完、用不尽的力量源泉。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们谁想到过个人的安危？谁想到过“平反”不“平反”呢？没有！我们唯一所想到的，就是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统统揪出来，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批倒、批臭！挖掉修正主义根子，使整个中国永远不变颜色！

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同志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多少双素不相识的、亲切支援的手向我们伸来！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作我们前进的灯塔，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战胜一切妖魔鬼怪，取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我们已经从原来几个人的队伍发展到几千人的队伍了！受蒙蔽的群众纷纷向我们靠拢，我们已经从“无产者”变成了掌握地院大权的“独裁者”；地质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已经乖乖地听从我们的指挥，他们昔日的威风已经扫地以尽了。

我们“平反”的初步胜利是坚持毛主席的教导，“自己解放自己”的结果。我们知道，阶级敌人还要作垂死挣扎，还梦想着复辟，还妄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我们也知道，全国革命派不彻底“平反”，我们的反也是平不彻底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决心横扫社会上的一切污泥浊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彻底胜利！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原载红卫兵首都三司小报《首都红卫兵》1966年11月30日

~~~~~

## 【往事追忆】

红卫兵小报和我（三十二）

• 周孜仁

“九五命令”以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全国稳健派的节日。所谓稳健派，是指与激进派对立的一派组织。他们和“重大八一五”一样多是老造反，相对比较注重秩序和纪律，所以比较容易得到军人的青睐。因为老造反，因此彼此之间联系时间就比较长。如西安交大的造反派，和重大八一五早在1966年八月刚刚出道时就建立了联系。和重大八一五长期交好的铁杆老造反，除西交大外，长春二总部、长沙高司，昆明八二三，平时也都时有电函往来、互相吹捧的。“拥军派”胜利了，彼此心情都好，更要互相走动了。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反修报》的主编来渝，《八一五战报》自然全程陪同，游览红岩村、渣滓洞诸景点，并相约在各自地点出版合刊，介绍两地的文革情况。合刊的“长春版”于12月16日在对方出版，头版文章曰：“乐在天涯战恶风——致英雄的重大八一五战友”；而“重庆版”则于12月25日在重庆出版。头版文章对等吹捧：“向英雄的二总部战友致敬”。除了写文章互相吹捧，派宣传队巡回演出也是互相沟通的好办法。昆明“八二三”的宣传队就到重庆来演出过《八二三风暴》，其模式当然也和《八一五风暴》一样，照《东方红》的葫芦画瓢而已。甚至武汉“钢工总”也派出代表携宣传队到重大慰问演出，“钢工总”可是在“七二〇事件”中出够了风头的激进派。代表团经过一番“调查研究”，竟然也于12月6日正式发表声明，大肆歌颂五十四军和张梁首长，力夸“八一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山城人民的骄傲，是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八一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发誓“做山城八一五派的坚强后盾”，与之“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真是有点邪门了。

也就在这时候，一件麻烦事找上门来了。

重庆大学不知怎么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求援信，是长沙高司赴京告状团寄来的。时间大约是12月10日，信中痛陈他们在京城备受百般苦难，如：被首都三司驱赶凌辱，如：被中央文革接待站冷眼相向，甚至说到：他们数百同学求告无门，成天只能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过夜，靠女同学卖血度日，云云。这封信被人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出来，在校园里立即引起巨大轰动。重大八一五1966年9月上京、1967年4月上京，都遭到过类似冷遇，只是没可怜到睡火车站、靠卖血度日的惨境。如今八一五已风光若许，同是老造反的哥儿们竟如此困顿，岂能不让人忧心难平？

同学们非常同情也非常义愤了。总团勤务员黄顺义还在风雨球场举行了一个全团大会，宣读这封信件，读得许多同学热泪盈眶。全校立即掀起了一个捐赠热潮：有钞票捐钞票，有粮票捐粮票，很快便积累了一个不小的数目。

战报的编辑们自然是很同情高司弟兄的。但是，面对全校轰轰烈烈的捐款热潮，我们却突然表现了出奇的冷静。报社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小报，信息比较灵——我想这样说明我们所收到的小报之多：几乎每隔两三个月，我们就要用板车把满满一车报纸拉去卖给废品收购站，然后买上两只鸭子和一筐土豆拿回编辑部狂吃烂饮一顿。这是题外的话——我们从小报上已经得知，长沙高司当时正是被中央文革搞得如此凄惨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呢，恰恰又是他们自己的人太过意气用事，比如说，为了发泄对戚本禹（戚当时还正在位上）的不满，他们公然仿照毛泽东语录歌“造反有理”的模式编写了如下一首歌曲：“戚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打砸抢抄。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杀人，就放火，就干资本主义。”（毛的原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如此直截了当地反对中央首长，其后果可想而知了。八一五当时日子刚刚好过一点，怎么能去粘惹这样不懂事的穷亲戚呢？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当时我们自觉得政治上已经很成熟了。明白作一个政客首先需要的是大脑而不是心。

于是我们紧急敦请总团勤务员黄顺义到报社一叙。黄一进来，我们就开玩笑说今天要对他进行再教育。我们说他当官当了这么久，为何作出如此不明智之举？接着我们出示了若干有关

高司的问题材料，以及中央首长有关的讲话，我们三、四个人轮番围攻，黄却自始至终不发一语。等我们说完，他表情沉重地拿着资料便走，只说：我回去考虑考虑。

我们非常担心黄的固执会把事情搞糟，于是和101部队（即辩论组）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大家平抑情绪，理性处理此事。事情终于引起了总团的关注，很快召开了全战斗团小组长会议，专门让战报和辩论组做中心发言，并且最后得出结论：将钱粮先行封存再议。

我们为自己的成熟而得意洋洋。其实，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后来发生的情况就是：在黄顺义的支持下，被暂时冻结的募捐钱粮，被人秘密带走，悄悄送去北京，交给了高司的哥儿们。秘密上京的人员之一，就是现已定居美国的刘云仁。刘，电机系三年级同学，为人善良而极富正义感。文革之初，即所谓“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工作组泰山压顶，被内定了右派学生的我有些吃不住了，想一个人秘密去京城告状。刘云仁不知如何知道了，遂悄悄和我约见。坐在风雨球场前的草地上，他真诚地向我捐赠了10元钱——对于我这个穷光蛋，这不啻是雪中送炭啊！后来因815事件骤起，个人行为已无意义，我又郑重其事把馈赠还给了他，而我们之间可贵的友谊却从此开始。

《815战报》没有能阻止事态的发展，反过来，我们自己却成了大众嘲笑的对象。战报编辑走到路上常常遭受围攻。大字报乾脆大骂我们是“臭文人”、“市侩”、“刀笔吏”，是发了财就忘了穷亲戚的土财主，大年三十把前来探访的乡戚赶出家门，等等。

几十年后专门把这一段经历写下来，是想说明当时的大学生是如何单纯可爱。即便已经过了九死一生，多历骗局，而他们的良知、正义感和激情，仍就那么地难以压抑。

那一段时间，是《815战报》创刊以来人气指数最低落的日子。

### 30，校革委会的成立和吴庆举的出走

1967年12月27日，即毛泽东七十四岁华诞第二天，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隆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成立当然意味已经“革命成功”，意味着已经大权在握，不能不大大庆祝一番。权力这东西实在太诱人又太害人。动乱年代，英雄豪杰窥视神器，策马问鼎，总要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而在和平年代，要让一个人犯错误，堕落，只用叫他为官一年半载（不论官位大小）就绰绰有余。对于权力崇拜，林彪的“518讲话”可谓到了极致。文革期间老百姓中由此衍生出来的名言警句就更多了，什么无产阶级“想的是夺权，看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什么“权权权，命相连；有了权，蜜样甜；没有权，苦黄连。”等等，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作为重庆第一个一边倒的权力机构，它的成立，对于重庆乃至四川的八一五派，其鼓舞激励，不啻是一针巨大的强心剂。

原来当然是想在毛的生日26日成立的。据说报告呈报成都军区审批时遇到了一点麻烦，大约说是委员中没有另一派的代表，事情不得不延宕下来。问题是，其时庆祝事宜万事具备，箭已在弦，不得不发。更何况梁兴初司令员在重庆坐阵指挥，这点面子总得给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成都军区不承认也很难办，只好批了。于此结果，正处于下风的刘、张自是无可奈何。拖了一天，虽然错过领袖的华诞吉日，不过反正批了，这就一好百好。重大八一五十分得意地对此事做了如此评价，称：“重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八一五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通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已经在重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无可辩驳地说明了我们八一五革命派在‘炮打司令部’，在大造李井泉、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斗争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中，在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反击来自右的和左的反动逆流的斗争中，在大树特树毛主席，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权威的斗争中，大方向始终正确。同时，给了那些煞费苦心

要颠倒历史，把我重大八一五打成‘叛徒集团’‘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跳梁小丑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给处心积虑要把八一五打成‘反红十条反动逆流’的刘结挺、张西挺及其信徒们当头一棒。”（《815战报》第56期文：“革命洪流，不可抗拒”）

重庆大学从造反开始，“八一五”在人数上就一直占优势。1966年底保守派跨台，八一五的优势更毋庸置疑。虽然后来出了个“井冈山公社”，头目徐光明和公社社员加起来也就不过几十号人，仅就数字而言，对于将近万人的大校来说，他们实在太无足轻重。更何况那时间他们还戴一顶“反军”“乱军”的帽子，徐社长被大家鄙夷地称为“坏社长”，日子很不好过，重大八一五在此时机抓紧把革命委员会成立起来，绝对只会一派掌权。

当然也考虑了“反到底派”的存在和徐的代表性。作为象征性的表示，按人数比例，给他们留了一个委员名额。至于其他委员，则由群众投票选举产生。关于这次内部选举，我以为绝对是民主的。后来张榜公布的选举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选举结果非常出人意料甚至还有点莫名其妙。榜示按票数多少顺序公布，选举结果——谁都没有料到——名列榜首的，竟然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典型老好人：贺尔金。

贺，电机系三年级学生。戴一付深度近视眼镜，永远对人微笑着。如果仅就外表，你的想象力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往“造反”“闹事”这上面扯。事实上，文革一年多，他确实没有半点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激动人心的说词，从没上过台出过风头，甚至压根儿就口齿木讷。皆因做事情老老实实，他一直在总团担任“财政大臣”，成天给大家记帐报帐，对人客客气气，工作任劳任怨，故而很得人心，民选中意外夺冠。票数排行第二的也是著名老实人，人称“老黄牛”的黄顺义。与此相反，外间大名鼎鼎的周家喻，票数公然落到第十！真让人匪夷所思。这也说明，同学们不管怎么造反怎么激进，折腾来折腾去，最终得人心的还是“老好人”。吴庆举得票第四，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老造反，名气不小，此外，还因为他在刚刚结束的武斗期间敢于挺身而出，大家觉得他够汉子气。

还有一个至今让人深感蹊跷的问题是，吴庆举尽管造反早，名气大，而且事实上一直在总团担任领导工作，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应该是校革委当之无愧的主要负责人。可在校革委会的最后名单中，他不仅没有当上副主任，甚至连常委都没有弄到一个，仅仅只当了个可有可无的一般委员。这自然让他恼怒万端：关于这件事，我们留待下面再说。

前面说到，庆祝大会原定在毛生日当天举行的。因为该庆祝会还有一个主题，就是重庆市最高的毛泽东塑像也将在那天同时举行落成典礼。塑像高9.15米，象征1966年9月15日八一五上京告状，到天安门广场觐见毛的“幸福日子”，塑像加台高共12.26米，象征毛的生辰吉日。碑台四边各宽8.15米，像后八根8.15米的旗杆，其意当然十分明确：象征815战士紧紧围绕毛干革命。像后有诗词屏一座，上刻毛词《满江红》“小小环球”一阕，初建成时用铜箔贴字，不意时过不久铜箔遂变质发黑，只好由警司特批，另外购买金箔重贴，得以几十年后光泽依旧。只可惜毛的塑像，落成之时，巍巍乎高哉，建造之时，专门延请全国最有名的毛塑像专家叶毓山亲自主塑，即便八月武斗，满天炮火纷飞，忠心耿耿的大学生亦日夜为尚为泥身的塑像站岗，好容易送上碑台，浇成了钢筋巨身。只可惜伟大领袖在高台没站上几年，文革中备受打击的当权者便重掌权柄，一声令下，好端端的毛就被炸了个粉身碎骨！

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就是在毛的巨像之下举行的。梁兴初、韦统太、兰亦农等高级将校一字儿在前排就座。从照片看，参加大会者不下数万。气球、彩旗、标语更多得无数不提。《815战报》破天荒地出了六个大版，内容共用五个板块和大量照片做了报导。主题两个，首先是毛塑像落成，其次是革委会成立。第一板块内容为“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

节日”，对革委会主任周家喻、副主任秦安全诸人及会场群众场面进行了报导；第二板块为“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梁、韦、兰等做了大幅报导；第三板块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共刊登照片三张：中印反击战斗英雄陈代富大会发言、警备区武装军人为大会值勤和解放军驻渝部队参加修建大会广场。第四板块为“火树银花不夜天”，全是照片：广场上礼花井喷之夜、重庆话剧团的话剧演出：《张思德》、重庆京剧团的京剧演出：《智取威虎山》、还有驻渝部队、西南民族学院等的演出，当然都是文革标准动作：一个个张牙舞爪，装腔作势，其智慧和美感绝不高于现代机器人。最后一个板块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是代表发言和全国各地的贺电贺信。从头检看，规格最高者当数李世英，文革一开始就名满天下的西安交大学生领袖。其余贺客及发信发电朝贺者为数极众，现将主要名单照录如后：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新北大公社  
同济大学革委会东方红兵团总部  
山东红代会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天大八一三  
贵州省红代会  
青海大学八一八联委  
郑州大学革命委员会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  
吉林省红革会长春市二总部  
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安徽工学院纵队  
新华工革委会  
武汉新湖大革委会  
武汉工造总司  
大连工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  
新厦大公社  
新浙大联总  
焦作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河南二七公社焦作矿院八一八兵团总部  
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  
新杭大公社、杭州大学革委会  
中山大学红旗公社  
四川林学院一〇一战斗团  
西昌一二·一三革命造反团  
开江二一〇联络总部  
夹江一〇一八司令部  
四川石油学院红岩公社  
辽联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斗团总团  
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办公室  
宜宾市红代会  
自贡红井总  
文红筹红卫兵内高总部（内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江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县地区支左领导小组、万县军分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充市人民武装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充人民武装部

如此盛事，有人高兴，当然就有人不高兴。“反到底”不高兴。刘结挺、张西挺不高兴。为此他们还专门让省革筹办驻重庆联络员郭凤歧写了一个《我们对批准重大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几点意见》上报，说重庆大学“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八一五’一派夺权”，“将捍卫‘红十条’的‘重大井冈山公社’排斥在外”等等。这些人不高兴很正常。不正常的是：自己窝里公然也有不高兴的，最不高兴的当数吴庆举。从‘八一五’造反起，再早一点，为郑思群鸣不平，反工作组，反市委，他从来都是领头牵线的。现在革命成功，他公然连主席台都上不了——我完全可以想像他心里的不平衡。吴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也极倔的人，革委会成立庆典，他上不了主席台，就担任了大会的纠察队长，站在一辆指挥车上（他故意站在车门口），挥舞手臂，在会场上来回穿梭，向拥挤不堪的人群大喊大叫。我看得出来，他需要向人们表示他的存在。我看得出来，他表情中非常愤怒。那一刻，我对他深感同情。

深夜，庆典曲终人散。东方红广场满地寒光，一片寂寞。吴突然来约我去那儿散步。那时候，只有毛的塑像还孤零零独立高台，巨臂直挥天穹，显得那么超凡脱俗。想起白日里的“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突然间让人有些悲哀。吴和我在学生宿舍邻室而居，文革开始又一起造反，生生死死，悲悲欢欢，患难与共，走在阒寂无人的广场，我们都无限感慨。他突然对我说：你信不信，我们内部的有些仇恨，可能比敌对势力还重！可能会记一辈子！

我知道他指什么，也猜到他是指什么人。我当然不希望革命刚刚成功，八一五又起个萧墙之祸，于是很轻松地笑了，我说：文革中发生这些恩怨，对我们个人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不是马上就分配了吗？就让你做个主任副主任又有什么意义？我真诚劝他：别把作官不作官看那么重！

那天晚上的谈话当然对他毫无作用。吴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非常有抱负的青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意外给了他那么一段的非凡经历，在和平年代的日子里，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杰出人物的。可恰恰是他的文革经历助长了他内心潜意识的偏执和不应有的自信，他最终被时代毁了。1995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回乡看望他。我们二人应该说都已饱经沧桑，对世事的洞悉当是很客观平静了，可当我对他在经商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深表赞叹，那一刻，他竟然还说了这样一句话：这算什么？我们这种人，原本该是当XXX的角色！出于对朋友、对死者的敬意，我把XXX三字隐去了，我祝愿他在阴界安息，阿门！

庆典次日一早，吴就带领学校的宣传队，在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前宣誓。然后去南充地区演出了。然后我很久没有再见到他。

这次演出的唯一印象就是温栋梁之死。温栋梁，四川自贡人，机械系四年级学生。业余尤精二胡。直到文革才发现他写讽刺文章更见了得，俚语笑料，信手拈来，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我的印象中，把保守派命名为“麻子兵”，始作俑者，就是他。他的死事发生在南部县。宣传队住在二楼，他们本已演毕就寝，不知如何来了一批武斗勇士，住楼下，并且开始擦枪，一颗误发走火的子弹便向二楼飞去，正正击中温的下身，流血不止，当即送医院抢救。倒霉的是，那一晚停电，整个南部县一团漆黑，医院无法手术。命中注定了他该于那个暗夜离去：于是他死了。

温成了重庆大学文革遇难的最后一位死者。第二十四位死者。

（未完待续）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